

超越东西文化的对立： 饭塚浩二的世界史理论研究

涂杰欣

【提要】 饭塚浩二的世界史理论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国内东西方文化对立的背景下,发展并成熟于战后阶段。他的世界史理论从地理学视角出发,将“东方”“西方”等地域性的概念还原到历史语境中,在努力克服“西方中心论”的同时,也超越了日本学界传统的东西文化对立的分析框架,为二战后日本学界提供了认识世界史的新视角。饭塚浩二从地理学视角探讨世界史理论,表现出鲜明的跨学科特征。

【关键词】 饭塚浩二 世界史 东方 西方中心论 地理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化成为日本社会的首要任务,这一点也反映在历史教育和历史研究领域,即要求清算皇国史观。1951年,日本在高中社会科科目中将二战前的东洋史和西洋史融合,设立了新的世界史科目。^①世界史学科的设立对相关的历史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探究新的世界史理论在战后初期成为日本史学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饭塚浩二是二战后日本积极探索世界史理论的诸多学者之一,不过他本人并非历史学专业出身,而是近代日本人文地理学从战前到战后发展转变的关键人物。饭塚浩二受到法国地理学派代表人物维达尔·白兰士^②的影响,重视人文地理学中的社会和历史因素。他从地理学视角研究世界史理论,不仅提供了一种超越“西方中心论”和东西文化对立的世界史认识,同时正如维达尔·白兰士对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那样,^③饭塚浩二的世界史理论也促进了战后日本世界史研究的跨学科发展,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征。因此,考察饭塚浩二的世界史理论对加深关于日本学界世界史研究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目前,学界对于饭塚浩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在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历程及相关成果和贡献方

① 二谷貞夫『世界史教育の研究』、弘生書林、1988年、34—35頁。二战前日本的历史教育一般分为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三大科目,这种划分与当时日本大学的历史教学体制有关。1887年,东京大学邀请德国人路德维格·里斯开设了“史学系”,两年后与“史学系”并立另外又开设了“国史系”。因此,在日本的大学制度中一开始就将西欧的“史学”和以日本史为对象的“国史学”视为两种不同的学问。1904年,东京大学将史学科目重新划分为国史学科、支那史学科、西洋史学科。1911年,支那史学科改称东洋史学科,至此日本近代历史学领域中的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三科制初步形成,并逐渐成为日本其他大学设立史学科目的常例。参见永原庆二《20世纪日本历史学》,王新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6—37页;冈田英弘《世界史的诞生》,陈心慧译,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84—185页;齐藤孝『昭和史学史ノ一ト:歴史学の発想』、小学館、1984年、150—153頁。

② 维达尔·白兰士(1845—1918年),法国近代地理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主要致力于人文地理学以及区域地理学的研究,代表作有《人文地理学原理》《法国地理学概貌》等。

③ 年鉴学派史学家勒华拉杜里曾说,年鉴学派最初受到四个方面的影响,即涂尔干的社会学;亨利·贝尔及其《历史综合杂志》所推崇的跨学科研究;弗朗索瓦·西米安所制定的价格、工资和环境的经济学史和法国地理学派。参见张绪山《史学管见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28页。

面。例如,冈田俊裕不仅探讨了饭塚浩二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带入地理学史研究中引起的变化,而且梳理了战争期间饭塚浩二的学术活动,并进一步考察了饭塚浩二的战后言论和他的亚洲观。^①与此相比,关于饭塚浩二世界史理论的研究则略显不足,缺乏系统性的论述,主要散见于一些零星的研究之中。例如,水津一朗的《饭塚浩二与人文地理学》一文,除了指出饭塚浩二在人文地理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外,也指出饭塚浩二的一些研究具有试图通过对地方性的强调构建多元世界史框架的意味。^②成瀬治的研究则对战后饭塚浩二的世界史理论有所涉及,分析了饭塚浩二关于“亚洲停滞论”以及亚非两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等方面的论述。^③本文旨在结合学界已有研究,梳理饭塚浩二的世界史理论,探究其阐释背景、分析路径以及相关内容和特点。

一、饭塚浩二世界史理论研究的发端

饭塚浩二于1906年出生在东京,父亲饭塚启是著名的动物学家。1930年,饭塚浩二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后,成为该部的助教,随后他的研究方向从经济史转向地理学。^④正是在这个时期,饭塚浩二接触到维达尔·白兰士的《人文地理学原理》一书,写出了论文《历史与人文地理学——维达尔·白兰士的见解》。饭塚浩二赞同维达尔·白兰士立论于生物生态学的观点,认为要改变以往机械地理解人地关系的地理学,必须引入生态学。^⑤在后来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中,他对历史学的强调很大程度正是出于对机械理解人地关系的不满。1932年,饭塚浩二前往法国索邦大学留学,研习德国和法国的地理学说与生态学说,撰写了《地理学史的诸问题》等文章。留学期间,饭塚浩二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层认识,他意识到,被视为统一的西方文化实际上具有丰富的地方性,并且那些被视为高度发达的地方文化,实际上只是特定地区在某一历史阶段的文化而已。^⑥在欧洲学习两年后,1934年饭塚浩二经由美国回到日本。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饭塚浩二的研究主要以介绍法国的人文地理学为主,相继翻译了白兰士的《人文地理学原理》和吕西安·费弗尔的《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等著作。^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饭塚浩二作为社会科学方面的学者投入日本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构建之中。^⑧饭塚浩二1941年任教于立教大学经济学部,1943年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二战后成为该所的所长。1967年,饭塚浩二退休后成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1970年因尿毒症于东京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逝世,享年64岁。

饭塚浩二早期的学术活动,是在对外侵略扩张的日本大肆鼓吹东西文化对立的背景下进行的。日本著名思想史学者子安宣邦曾指出,近代以来日本与“世界史”的关联有三个重要时期:第一个时

① 冈田俊裕「飯塚浩二の地理学史研究」、『地理科学』22卷、1975年;冈田俊裕「15年戦争期の飯塚浩二」、『地理学評論』52卷第5号、1979年;冈田俊裕「戦後初期における飯塚浩二の言論活動(上)」、『地理科学』34卷、1980年;冈田俊裕「戦後初期における飯塚浩二の言論活動(下)」、『地理科学』35卷、1981年;冈田俊裕「飯塚浩二のアジア論」、『人文地理』37卷5号、1985年。冈田俊裕的这些研究后来收入其著作《近现代日本地理学思想史:个人史的研究》中。参见冈田俊裕『近现代日本地理学思想史:个人史的研究』、古今書院、1992年。

② 水津一朗「飯塚浩二と人文地理学」、『人文地理』23卷6号、1971年。

③ 成瀬治『世界史の意識と理論』、岩波書店、1977年。

④ 冈田俊裕『近现代日本地理学思想史:个人史的研究』、古今書院、1992年、17—20頁。

⑤ 冈田俊裕『近现代日本地理学思想史:个人史的研究』、21頁。

⑥ 冈田俊裕『近现代日本地理学思想史:个人史的研究』、23頁。

⑦ 冈田俊裕『近现代日本地理学思想史:个人史的研究』、28頁。

⑧ 冈田俊裕「15年戦争期の飯塚浩二」、『地理学評論』52卷5号、1979年、239頁。

期始于19世纪50年代,“东亚”逐渐被纳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中,日本则通过“世界史”的图景将自己塑造成近代国家;第二个时期始于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成为“世界秩序”的重要成员和积极参与者,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直至1945年战败,日本一直尝试构建新的“世界史”和“世界秩序”;第三个时期则是二战后。^①在第一个时期,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将当时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了文明、半开化和野蛮三类。他主张,处于半开化和野蛮状态的国家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并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②福泽谕吉针对日本现状提出了“脱亚入欧”的方针,要求在追求西方价值观念的同时与亚洲所代表的“落后”观念决裂。

与主张“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不同,强调重视亚洲本土价值理念的声音在日本也一直存在,冈仓天心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福泽谕吉和冈仓天心被认为是代表近代日本对亚洲截然不同态度的两位思想家。^③福泽谕吉对“亚洲”的批判是极其明确的,对他来说“文明”才是唯一的价值,“亚洲”作为“文明”的对立面是反动价值的象征。^④冈仓天心在《东洋的理想》一书中声称“尽管亚洲的简朴生活与欧洲的蒸汽电力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亚洲并不需要在这一点上感到耻辱”;^⑤他强调:“今天的日本已经被大量的西方思想所搅扰,所以,日本在维新的同时也应该回溯过去,在那里寻求这个国家所需要的新的活力”。^⑥

日本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进一步鼓吹东西方文化的对立,自以为是所谓新的东方文化的代表。例如在侵占南京后,日本不仅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还大肆宣传所谓南京的陷落是东洋史和世界史上“新的一页”,宣称“西方文化的原理正在失去光芒,而新的东方文化正在照亮世界”。^⑦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日益加强东西文化在价值对立方面的宣传,强调世界混乱的根源不一定是国家利益的对立或单纯的民族感情的冲突,而是深层的思想对立和世界观的矛盾,由这种矛盾和相克而来的生死决斗,就是世界大战的真相。^⑧日本与美国的对立便是东洋文化的代表与西洋文化的代表之间的冲突对立。^⑨

战时日本逐渐营造出一种“危机感”和“使命感”。这种“危机感”强调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对日本展现出的“敌对性”,日本如果坐视不理就会陷入极端的困境之中。^⑩冈田俊裕指出,饭塚浩二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一开始并没有发表迎合当局的言论,而是埋首于翻译法国的人文地理学著作;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当饭塚浩二认识到日本要与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美国对抗时,便产生了上述所谓的“危机感”,转而认同日本所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⑪所谓“使命感”,则是大肆鼓吹日本发动的战争是所谓的“解放战”和“建设战”。^⑫饭塚浩二宣称,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是为了切

① 子安宣邦『「アジア」はどう語られてきたか 近代日本のオリエンタリズム』、藤原書店、2003年、26—27頁。

②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9—11页。

③ 橋川文三「福沢諭吉と岡倉天心」、『橋川文三著作集』(7卷)、筑摩書房、1986年、52頁。

④ 橋川文三「福沢諭吉と岡倉天心」、『橋川文三著作集』(7卷)、54頁。

⑤ 岡倉天心『東洋の理想』、講談社、2002年、204頁。

⑥ 岡倉天心『東洋の理想』、209—210頁。

⑦ 「新しき世界歴史の頁」(巻頭言、『大亜細亞主義』1938年1月号)。

⑧ 「日本の道義観とアングロサクソンの世界観」(巻頭言、『大亜細亞主義』1941年12月号)。

⑨ 「日米対立の文明史的意義」(巻頭言、『大亜細亞主義』1940年11月号)。

⑩ 大政翼賛会宣伝部編『大東亞戦争とその前途』、大政翼賛会宣伝部、1941年、32—34頁。

⑪ 岡田俊裕「15年戦争期の飯塚浩二」、『地理学評論』52巻5号、237—238頁。

⑫ 中谷武世「亜細亞の解放と世界維新 解放戦並に建設戦としての大東亞戦争」、『大亜細亞主義』1942年1月号、5頁。

断“外来势力施加在东亚被压迫民族身上的铁锁”。^①于是,饭塚浩二对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史理论提出了质疑。与同样为日本侵略辩护的京都学派的世界史理论不同,饭塚浩二不是从哲学意识层面出发,而是主要从历史发展层面展开论述。在他看来,世界史的形成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关。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使得从古代就存在零星联系的不同地域形成了一个彼此联系更紧密的有机整体,世界史也才得以形成,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是欧美各国能够率先开始近代化的关键。“近代化”是饭塚浩二世界史理论的核心,他从近代化的角度强调日本在近代化方面的成功赋予了日本“领导”亚洲的角色。

日本战败后,饭塚浩二也从近代化视角反思日本的战争。他认为近代的总体战不仅是物质方面的消耗,也是精神文化方面的比拼。^②日本的战败恰好暴露了日本的近代化存在的问题,即明治以来的绝对封建主义同时包含的进步的、近代性的一面与中世纪的、非理性的一面之间的矛盾,他认为两者的冲突最终导致了日本的战败。^③饭塚浩二指出,日本明治以来的近代化是一种“和洋折衷”的近代化,即在意识形态等精神文化领域保存了近代市民社会以前的非理性因素,仅在物质文化层面强行近代化。^④

二、饭塚浩二世界史理论的内容

二战后,日本社会面临着民主化的任务,这在历史学领域一方面体现为要求对以京都学派世界史理论为代表的军国主义历史观进行清算;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新学科的设置上。二战后,日本将战前的“东洋史”和“西洋史”合并成为新的“世界史”学科,为了符合战后民主化的要求,战后日本的世界史学科试图从欧洲市民社会的形成及其民主主义发展的角度寻求历史认识的价值标准。^⑤在这样的背景下,今井登志喜主编的《世界史概说》、东京大学史学会主编的《世界史概观》等以“世界史”为名的通史性书籍陆续问世,但这些作品仍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论”的色彩。^⑥此类世界史作品显然与现实发展不符,战后出现了许多非西方的新国家,正是世界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这就要求新的世界史认识,要求对世界各地的多样性、独特性进行分析。^⑦

饭塚浩二战后的世界史理论研究延续了此前质疑“西方中心论”的一面,但逐渐摆脱了东西文化对立的视角。他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将“东方”和“西方”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分析,试图构建一套超越东西文化对立的世界史理论。总的说来,饭塚浩二的世界史理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饭塚浩二的世界史理论是他对知识结构的反思。他对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向西方一边倒式的学习方式提出了质疑“我们学生时代的学习,是不是偏重于学习西方而且还是书本上的西方?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对那些本来为近代西洋人所设的理论比那些西洋人还着迷呢?”^⑧同时,

① 岡田俊裕「飯塚浩二のアジア論」、『人文地理』37巻5号、1985年、3頁。

② 飯塚浩二「比較文化論のための素描」、『飯塚浩二著作集』(1)、平凡社、1974年、15頁。

③ 飯塚浩二「東洋の社会の変貌」、『飯塚浩二著作集』(2)、平凡社、1975年、303頁。

④ 飯塚浩二「東洋の社会の変貌」、『飯塚浩二著作集』(2)、297—298頁。

⑤ 二谷貞夫『世界史教育の研究』、弘生書林、1988年、35頁。

⑥ 今井登志喜『世界史概説』(上、下巻)、日本出版協同株式会社、1949年;東京大学文学部内史学会編『世界史概観』、山川出版社、1949年。

⑦ 高橋彰「解題」、『飯塚浩二著作集』(1)、486頁。

⑧ 飯塚浩二「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飯塚浩二著作集』(4)、平凡社、1975年、66頁。

他指出由于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处在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之中,因此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日本对世界地理和世界史的认识也不可避免地染上了“西方中心论”的色彩。^① 饭塚浩二强调,由于近代欧洲在世界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导致其优势也延伸到历史领域,这被他称之为“越境现象”,即欧洲尤其是西欧由于发生了工业革命的划时代变化使得“世界欧洲化”,在世界史的研究认识上也发生了类似“欧洲化”的现象。^② 他指出,欧洲的世界史叙事在史料的取舍上往往通过牺牲其他地区和民族的历史来美化欧洲过去,从而塑造欧洲始终充满荣光的形象。^③ 除了批评向西方一边倒式的学习方式,饭塚浩二也批判“和洋折衷”式的学习方式,在他看来,日本战败已经意味着这种学习方式的破产。

不过,饭塚浩二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化和工业化的近代欧洲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形成。在他看来,正是由于近代欧洲打破了封建社会经济的“停滞”,建立了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新文化,才最终形塑了世界各地之间新的势力关系,从而奠定了近代世界史的框架,探究其中缘由正是理解近代世界史最为重要的一点。^④ 饭塚浩二认为,世界史应该是人类相互关联的历史,而“居住在地球上不同地区的人类由共同的秩序联系在一起是近代才出现的情形,因此世界史的形成也是近代以来才有的事情”。^⑤ 不过,这种人类由共同秩序联系在一起的情形并不是各地区平等交流而是西方强制的结果。^⑥

其次,饭塚浩二是从世界地理变迁的角度阐释世界史理论。他指出,地理名称处在历史变动之中,具有相对性。例如,今天人们一般将撒哈拉沙漠南北地区统称为“阿非利加”(Africa),但在古代“阿非利加”最初只是指北非地中海沿岸的一小部分。^⑦ 他认为,对地名变化背后所示含义的忽视,导致了非洲被认为有史以来一成不变的错觉。^⑧ 在研究近代欧洲霸权确立的过程中,除了注意欧洲不断向外扩展的行径外,也不应忽视欧洲在“地理上的侵略”。^⑨ 饭塚浩二所说的“地理上的侵略”,并不是通常殖民叙事中侵占土地的殖民活动,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地理学上的侵略”,正如欧洲列强对世界史叙事的垄断一样。

对地域“历史性”的强调是饭塚浩二世界史理论的核心。在他看来,“东方”和“西方”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针对人们一般将东西方的划分追溯到雅典时期、认为当时波斯帝国所代表的亚细亚是“野蛮而专制”的而希腊代表的欧洲是“自由而开明”的观点,饭塚浩二指出,古典时代无论是希腊城邦时期还是罗马时期,当时的地中海世界都既不是“西方”也不是“东方”。这样简单的两分法无疑忽视了地中海世界古典时代在地理和文化方面的统一性,尤其是东地中海沿岸发展起来的世界史上最早的地区之间的商业贸易,使得地中海世界的整体性更不容忽视。^⑩ 饭塚浩二还指出,在当时希腊人的意识中,欧洲、亚洲与希腊人所在的地区是共存的,如亚里士多德在论述关于气候与民族性的关

① 饭塚浩二「東洋の文化」、『飯塚浩二著作集』(2)、390頁。

② 饭塚浩二「東洋史と西洋史のあいだ」、『飯塚浩二著作集』(2)、13頁。

③ 饭塚浩二「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飯塚浩二著作集』(4)、45頁。

④ 饭塚浩二「東洋の文化」、『飯塚浩二著作集』(2)、357頁。

⑤ 饭塚浩二「世界史と地理学」、『飯塚浩二著作集』(6)、140頁。

⑥ 饭塚浩二「世界史と地理学」、『飯塚浩二著作集』(6)、147頁。

⑦ 饭塚浩二「東洋史と西洋史のあいだ」、『飯塚浩二著作集』(2)、13頁。

⑧ 饭塚浩二「東洋史と西洋史のあいだ」、『飯塚浩二著作集』(2)、19頁。

⑨ 饭塚浩二「東洋史と西洋史のあいだ」、『飯塚浩二著作集』(2)、39頁。

⑩ 饭塚浩二「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飯塚浩二著作集』(4)、39頁。

系时就将欧洲、亚洲与雅典所处的世界区分开来,认为欧洲民族活泼勇敢但缺乏智慧和技术,亚洲民族拥有智慧和技術但缺乏勇气,希腊民族则居中兼有智慧和勇气。^①

饭塚浩二认为,到中世纪,“东方”和“西方”指示的范围发生了变化。罗马帝国的瓦解造成了欧洲城市生活、商业以及交通的衰落,尤其是在八世纪伊斯兰教控制了地中海世界后,欧洲就完全被排除在地中海商业圈的范围之外了,被“封闭在自我的小天地里”。^②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这个时期“东方”范围的扩大,即在伊斯兰世界统治伊比利亚半岛后,伊比利亚半岛也成为“东方”。正如近代日本被认为是东洋中的“西洋”一样,饭塚浩二认为,这个时期的伊比利亚半岛则是西洋中的“东洋”。到了近代又出现“近东”“远东”等一些新的地域称呼,他分析这是因为地域之间的频繁交往使得原有地域名称体系发生了变化。对欧洲而言,随着与东方未知地域交往的增加,当“东方”(Orient)这个词不再够用时就出现了“极东”(Extreme Orient)的称呼,“东方”的称谓就进一步分成了“近东”“中东”“远东”(Far Orient)等新名称。^③

最后,饭塚浩二的世界史理论从东西文化比较的角度驳斥了所谓“亚洲停滞”问题。在他看来,东西文化的比较不是与时代无关的超历史性的问题,文化比较存在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横向比较和相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纵向比较,横向的对比和纵向的对比在性质上是相通的,世界历史就是通过这两个过程相互交织而展开的。^④饭塚浩二同时指出,问题在于人们进行东西文化比较时,往往只注意横向的比较,忽视纵向的比较。例如,当人们谈论亚洲的特色时,实际上几乎都是在与欧洲的对比中得出的,多数比较都忽视了两者的内部的发展问题,从而产生了诸多无视时代性的论述,如将原本应是封建社会与近代市民社会的差异问题当成了亚洲与欧洲的差异问题。^⑤

饭塚浩二指出,在进行东西文化的比较时,论者往往关注的是近代化的欧洲,同时为了论证欧洲是近代社会的代表,又仅以西欧极少数“先进文明”国家作为例证,这样的做法似乎成为心照不宣的共识;与之相对应的是未能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发展出资本主义的亚洲,这样一来“停滞”就逐渐被视作亚洲的特色,甚至被认为是由亚洲社会的内在结构决定的。^⑥这种带有宿命论式的论断是饭塚浩二极力反对的,他认为,所谓“停滞”不是生产力没有得到发展或生产关系没有发生变化,而是村落的自然经济力量过于强大,压制了发展或变化的可能。^⑦因此,饭塚浩二提醒到,如果讨论“停滞”,不能忽视的是中世纪的欧洲也被认为是“停滞”的,是一个囿于权威主义和墨守旧规成俗的社会。^⑧所以,单纯将亚洲的历史视作“停滞”的做法无疑是一种非历史性的结论。饭塚浩二还认为,所谓亚洲的“停滞”不完全只是亚洲社会自我发展的结果,其中还有近代欧洲的因素,即近代欧洲在亚洲进行殖民扩张时利用亚洲当地的旧统治体制进行间接统治,这使得旧体制得以保存,从而阻碍了亚洲革新力量的发展。^⑨

所以,饭塚浩二认为,“停滞”是东西方历史中都存在的现象,欧洲为何会率先发展出近代资本主

① 饭塚浩二「東洋の文化」、『飯塚浩二著作集』(2)、371頁。

② 饭塚浩二「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飯塚浩二著作集』(4)、40頁。

③ 饭塚浩二「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飯塚浩二著作集』(4)、43頁。

④ 饭塚浩二「比較文化論」、『飯塚浩二著作集』(1)、17頁。

⑤ 饭塚浩二「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飯塚浩二著作集』(4)、74頁。

⑥ 饭塚浩二「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飯塚浩二著作集』(4)、74頁。

⑦ 饭塚浩二「世界史における東洋社会」、『飯塚浩二著作集』(2)、267頁。

⑧ 饭塚浩二「東洋史と西洋史とのあいだ」、『飯塚浩二著作集』(2)、9頁。

⑨ 饭塚浩二「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飯塚浩二著作集』(4)、199頁。

义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①但欧洲学者往往只从欧洲内部去探寻欧洲文明在近代发展的原因,而近代世界历史的事实却是近代欧洲的发展是建立在对亚洲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财富掠夺的基础之上。饭塚浩二提出,如果没有这个物质基础,近代欧洲不可能发展得如此迅速,这也导致了一个后果,即欧洲势力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的同时也加深了自身对其殖民地区的依赖。^②

饭塚浩二的世界史理论探讨始于二战时日本东西方文化对立的背景下,形成并成熟于二战后。他的世界史理论从地理学的视角出发,将“东方”“西方”等地域性的概念重新还原到历史过程之中,在尝试克服“西方中心论”的同时,也消解了日本学界的东西文化自古以来就处于对立的刻板印象。

三、饭塚浩二世界史理论的特点

饭塚浩二的世界史理论研究,特别是强调历史学与地理学相结合的主张,推动了二战后日本在人文科学领域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具体而言,他的世界史理论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饭塚浩二从地理学的角度对世界史进行的探究拓宽了二战后日本世界史研究的维度,突破了学科间的壁垒。这种世界史理论的跨学科特征首先与其在学术上所受影响相关,尤其是维达尔·白兰士批驳人文地理学中存在的非历史机械论思想对饭塚浩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40年,饭塚浩二在翻译白兰士的《人文地理学原理》一书时,在日文版的“解题”中写道“人类在通过自身的生理机能与自然进行联系的同时,也通过社会生产过程与自然发生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社会生产过程遵循历史发展的规律,那么就应该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把握人类社会与自然的联系,自然条件的具体内容只有在历史的限定中才能被正确理解。”^③年鉴学派的吕西安·费弗尔的跨学科研究倾向也影响了饭塚浩二。费弗尔注重打破学科之间的“围墙”,明确提出进行跨学科的多学科研究。^④费弗尔的《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一书便是历史学与地理学相结合的产物,饭塚浩二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⑤其次,战后日本的历史研究中,存在一股打破学科壁垒进行综合研究的浪潮。1946年秋,文部省为了“消除学科各领域的壁垒,推进综合性学术研究”,成立了由当时日本学界一线研究人员组成的“人文科学委员会”。^⑥饭塚浩二是这股浪潮的有力倡导者之一,他强调历史学与地理学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主张没有能够正确把握人类社会面貌的历史学,地理学和历史学就不可能建立正确的联系,反之亦然。^⑦

第二,饭塚浩二的世界史理论具有较强的唯物论色彩。这尤其体现在战后他对战前日本文化的反思当中。1946年,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组织了以饭塚浩二为中心的东洋文化讲座,“何为近代”是贯穿这个讲座的主题,以这个问题为出发点,讲座对西洋文化和东洋文化进行了比较,并探究东洋中的日本在社会、政治、文化方面的特异性。^⑧饭塚浩二相继写了一系列关于东西文化对比的著

① 饭塚浩二「世界史における東洋社会」、『飯塚浩二著作集』(2)、271頁。

② 饭塚浩二「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飯塚浩二著作集』(4)、197—198頁。

③ 成瀬治『世界史の意識と理論』、岩波書店、1977年、31—32頁。

④ 张广智《史学:文化中的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11页。

⑤ 岡田俊裕『近現代日本地理学思想史:個人史的研究』、63—71頁。

⑥ 成瀬治『世界史の意識と理論』、18頁。

⑦ 饭塚浩二「『人文地理学原理』新版に寄せて」、『飯塚浩二著作集』(6)、454頁。

⑧ 成瀬治『世界史の意識と理論』、18—19頁。

作。1948年,他出版了《比较文化论》《世界史当中的东洋社会》等书,试图从地理学的角度对日本存在的东西文化对比做出解读。之后,他以此为切入点开展了进一步的探讨,又出版了《亚洲之中的日本》(1960年)、《东洋史与西洋史之间》(1963年)和《对东洋的视角与对西洋的视角》(1964年)等书。在这些研究中,饭塚浩二否定了偶然性、个人因素在历史中的决定作用,偏向于从结构层面探讨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例如,饭塚浩二认为,将日本对外战争的原因归咎为部分军人派系斗争的理解看似合理,却容易将偶然性的因素过度放大,从而影响对战争的整个看法,像战争这样对历史进程而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不可能由偶然性的因素起决定性作用。^①此外,饭塚浩二虽然反对“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史,但并不反对西方理论本身,他对近代欧洲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精神以及以此为基础构建的理性主义十分信服。^②他指出,在对自然现象的研究中,中世纪神学和唯心论的方法因为暴露出难以挽救的缺陷最终以失败收场,而唯物论的研究方式则推动人类对自然现象研究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③也正因此,饭塚浩二对无视当地经验而将欧洲的理论生搬硬套在欧洲之外地区的做法十分排斥。譬如,他批评人们往往将近代欧洲作为欧洲社会的特点,并将与之相对的称为亚洲特色,他提醒这种做法无疑也否定和瓦解了近代欧洲之前的欧洲历史。^④

第三,重视对“规律”的探索。饭塚浩二的世界史理论重视探究历史发展中的规律与他对科学的认识有关,在他看来,如果将历史视作一门科学,那么探究规律就是其内在的必然要求。在这方面,饭塚浩二受到了涂尔干思想的影响。涂尔干认为,“我们必须清楚社会也是实在,类似于那些构成其他科学研究领域的实在,社会具有一种我们不能随意改变的特性,而且也会受到从这一特性中必然派生出来的规律的支配。”^⑤涂尔干强调社会学只有在两个相互关联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形成和发展,即首先是传统主义丧失它们的支配地位;其次是有了一种名副其实的信念,这种信念能够借助理性的力量,敢于将最复杂、最不稳定的实在转换成确切的术语。^⑥饭塚浩二受此影响,将其延伸到对历史的理解上,指出在传统主义和教义具有绝对权威的社会中,任何将社会结构和国家形态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行为在“道德上”是荒谬的。^⑦他强调,在排斥发展和进化的社会里,不可能产生出研究发展过程和历史推动力的历史科学。饭塚浩二认为,这使人意识到自身作为环境主体的能动立场,而不是单纯地从宿命论的角度来接受自然环境;对于社会来说,我们只有看清社会现象的内在规律,并按照规律行动,改革社会环境的意图才能有结果。^⑧历史作为饭塚浩二分析社会的维度之一,自然也处在一定的规律之中,如果要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那么无疑应坚持对规律的探索。

结 语

饭塚浩二的世界史理论探索发端于战时,处在日本大肆鼓吹东西文化对立之际。但不同于当时

① 饭塚浩二「歴史の推進力」、『飯塚浩二著作集』(1)、98頁。

② 古島和雄「解題」、『飯塚浩二著作集』(4)、493頁。

③ 饭塚浩二「歴史の推進力」、『飯塚浩二著作集』(1)、102頁。

④ 饭塚浩二「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飯塚浩二著作集』(4)、86頁。

⑤ 涂尔干《涂尔干文集》第10卷,渠敬东等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485页。

⑥ 涂尔干《涂尔干文集》第10卷,第493—494页。

⑦ 饭塚浩二「歴史の推進力」、『飯塚浩二著作集』(1)、109頁。

⑧ 饭塚浩二「踏みとどまろうとする心」、『飯塚浩二著作集』(4)、378頁。

从哲学理念出发研究世界史理论的京都学派,饭塚浩二从地理学视角对世界史的形成做了不同的阐释。他认为世界史的形成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让存在着零星联系的不同地域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世界史也才由此得以形成。在二战后对世界史理论的探索中,饭塚浩二进一步从地理学的视角出发,将“东方”“西方”等地域称谓带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超越了东西文化比较中可能存在的对立视角。

近代以来日本存在的东西文化对立,很大程度上是强调欧洲经验普遍性的主张和重视日本本土经验的主张之间的矛盾。两者之间的紧张和矛盾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逐渐趋向极端。在二战后的日本,如何看待文化比较背后的特殊与普遍的关系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饭塚浩二从地理学视角对世界史的探索,让“西方”和“东方”都回归于地域性之中,即“西方”的理论也是从“西方”这个地域发展而来的。近代以来欧洲势力的优势地位导致欧洲将这种优势扩展到历史学与地理学等知识领域。在饭塚浩二看来,从原理上来讲,世界史构造的形成应是多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地区相互关联的过程,但事实上近代世界史的形成是以欧洲势力扩张的形式进行的,并不是各地区之间交流相互加深的结果。^①正是这个差异,导致原本与“东方”一样是地域性的“西方”,获得了“西方中心论”的地位。

当然,饭塚浩二的世界史理论研究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有学者指出,饭塚浩二的考察对象不仅包括日本、中国、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内陆亚洲,还囊括了非洲和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因此可以说饭塚浩二的研究具有全球视野。^②但也正因此,饭塚浩二对世界史的理论探究偏于宏观性的阐释,缺乏详实的实证研究的支撑。水津一郎认为,尽管饭塚浩二从地理学视角出发的世界史理论摆脱了“一般理论的西方式偏向”,强调了地域研究的必要性,但缺乏深入的探讨。不过,水津一郎同时也鼓励下一代研究者以饭塚浩二的观点为基础,积极探究区域的深层结构。^③从这一点来看,饭塚浩二的世界史理论存在的不足或许能够提醒研究者进一步努力关注的方向。

总之,饭塚浩二从地理学视角对世界史理论展开的探讨,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征。他的世界史理论以对地域的解读为切入点,将“西方”和“东方”放到具体的语境中进行阐释,超越了日本学界东西文化对立的传统视角,为理解世界史的发展和特点提供了学术启示。

(作者涂杰欣,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430072)

(责任编辑:董欣洁)

(责任校对:李桂芝)

① 饭塚浩二「世界史と地理学」、『飯塚浩二著作集』(6)、147—148頁。

② 荒松雄「解説」、『飯塚浩二著作集』(1)、472頁。

③ 水津一郎「飯塚浩二と人文地理学」、『人文地理』23卷6号、1971年、61頁。

An Analysis of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United Community // Duan Jinsheng , Jiang Zhenghu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united community is a complex concept form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history and reality , ideas and practices. The confrontation and “competition to annihilate” between the Yi (ethnic groups) and the Xia (Han people) in the pre-Qin period evolved into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two , and eventually formed a larger and more stable union. The pre-Qin concept of “Tianxia” (all under heaven) was a root in forming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belief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united community. The changes in its manifestations and meaning underwent two stages before and after the Qin demarcation. In this process , it evolved into an order that included and integrated both the Huaxia people (Han) and the Siyi (ethnic groups) .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social order between Hua and Yi in the transition of the two stages before and after the Qin , one needs to focus on the guiding role of the concept of Tianxia.

Engaging in the Medieval Sensory History: Theory , Practice , and Perspective // Dong Ziyun

Since the 1980s , the study of sensory history , or history of the senses , has increasingly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community. Thanks to the efforts of scholars such as David Howes and Constance Classen , sensory history is now grounded with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ccording to their theoretical framework , sensory history is essentially a sociocultural approach to the senses and sensoria in history. Sensory history focuses on the changes and diversities of emotional models and emotional orders , with a special emphasis on multi-sensoriality rather than single sensory. Specifically with regard to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Western Europe , the theme of the five senses in theology and literature has been under intensive study. At present , the practice of medieval sensory history has been productive , but there is also the risk of its “etioloation”. To avoid potential pitfalls and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senses , future researchers may need to combine sensory history with socio-economic history , history of political culture , and history of legal culture.

Historical Universality in Microhistorical Studies: Rethinking Carlo Ginzburg ' s Theories on Microhistory // Li Gen

Based on the conceptual approaches of “normal exceptions” and “evidential paradigms” , Carlo Ginzburg has demonstrated the rationality of revealing historical universality from abnormal exceptions. In view of the signs of coercion and inducement in judicial files , he infers that abnormal cases may imply a general phenomenon deliberately suppressed , i. e. , “normal exceptions” . The concept of “normal exceptions” contains speculative elements , but Ginzburg reinforces the reliability of such speculation with the concept of “evidential paradigm” . These two concepts allow Ginzburg to work on microhistory without excessive reliance on anthropological models and to focus more on the “historian ' s craft” . However , the method of conjecture contradicts the positivist principle of historiography , and its rationality remains to be debated. Microhistory has not yet achieved the task of discussing the universal question on its own. The combination of micro and macro remains the most feasible strategy to tackle this issue.

Beyond the Dichotomy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Koji Iizuka ' s Theory on World History // Tu Jiexin

Koji Iizuka started his theoretical work on world history in the context of rising conflict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Japan during World War II. His theory further developed into maturity in the post-war times. He based his inquiry in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and he took the concepts of the “Orient” and the “Occident” back in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 In trying to overcome the “Western Centricism” , he also went beyon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ultural dichotomy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post-war Japan to understand world history. In addition , Koji Iizuka ' s exploration of world history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also contains distinct inter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